



□李学朴

巷子指小街道、胡同或者狭窄的通道，北方叫胡同，南方主要称巷子。

巷子是地域文化的独特载体，它涵盖了建筑、饮食、民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城市最直接的文化印记。地处鲁西北的运河名城临清，古色古香的巷子星罗棋布，它不仅是临清的地理标志，还是临清古城的骨架，更是临清老百姓生活的场所。

明代，临清商业营销量最大的一是棉布绸缎，二是粮食。棉布绸缎来自江南，临清是当时北方地区最大的转贩市场之一。当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工商业城填，如苏州府所属的盛泽镇、震泽镇，嘉兴府所属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府所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是专门经营丝绸纺织业的市镇。此外如松江府和嘉定府所属的枫泾镇、朱家角镇等，则是从事棉布生产和交易的中心集镇。当时山东棉纺织业尚不发达，需从江南大量输入棉布绸缎。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言：“今北土之吉贝（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鬻北。”运销至华北、西北及辽东地区以供军、民用的布匹，绸缎大多经由运河北上，以临清为中转枢纽。

明人陈继儒说，“北走齐鲁之效，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临清旧称）为转毂。”由此可知，江南布匹不仅行销至山东，而且经临清转销，到达京师和北部边疆。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记载：“白布巷，自明成化二年，苏州、南翔、信义三会合而为行，隆、万间寝盛，岁布八百万有奇。”其时，临清年经销布匹至少有一二百万匹，加上绸缎为数更巨，使临清成为北方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

临清古城区的老街巷、老胡同，起始于元代，繁盛于明清，到民国初期，临清的胡同街巷达500多条。大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使临清经济繁荣，更使临清形成了一大批商业街巷，白布巷便是其中之一。

据《临清县志》记载：“临清处汶卫交汇之地，每届漕运，帆樯林立，货积山堆”。漕运的兴盛，促进了临清工商业的发展，尤其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更是走在全国前列。明代万历年间，临清手工织布作坊已初具规模，《明实录》记载：临清“家家纺车转，户户机杼声”。临清纺织手工业发达，一是因为临清当时是商业重镇，大批的能工巧匠会聚，纺织技术优于其他地方，二是因为临清处于产棉区，三是因为临清商业资金雄厚，徽商、晋商钱庄林立。

明成化元年，有一王姓商人，在临清白布巷始建手工操作的织土布作坊，有机三十余张。《临清直隶州志》记载：“成化二年苏州会馆、南翔会馆、信义会馆联合成立‘一左元号’白布收庄”“岁进布百万有奇”。乾隆《临清州志》卷二市场2页记载：“白布商店在白布巷，自明成化二年苏州南翔信义三会合而为行。”

史料记载，明隆庆年间，“岁进布百万有奇，每岁轮行首一人，司一岁出入。凡庆谒馈献宴饮交际大至贷饷助公，行

首主其事，费用宏巨。其时店口甚伙，即一左元店字号，出银每锭必点一朱，每年需用银朱三二十斤不止，合以各家其费难量，今则各街俱有布店自济宁昌拔贩”。

临清运河岸边有一座明万历年间修建的舍利塔，共九层，塔内中心有60余米高的金丝楠木塔心柱，每层修建费用不下六七百两白银。其中第六层嵌有《舍利宝塔第六层纪造》石刻，记载了徽州布商王道济在明万历四十五年，捐资建造第六层塔身的经过。碑文载“信官王道济，捐资独力完工，济字康叔……年六十岁，祖籍徽州府歙县，世习临清布业。”从碑文可知，王氏是长期寓居临清经营棉布行业的大商人，由此也可管窥临清布业经营规模之宏大。至今临清中洲古城区犹存“白布巷”古巷名。相传临清“四大宁寺”之一的净宁寺，是由山西白布商人修建的，庙建成后，将其塑在庙内，供后人祭祀。

临清竹竿巷，是临清古城区最有名的一条街巷，竹竿巷形成于明代，它是运河沿岸经济发展的产物。临清地处北方，不盛产竹子，为什么会形成江北最大的竹货贩卖、加工的街巷——竹竿巷？

这是因为，临清是大运河上的“漕挽咽喉”，素有“运河第一大码头”之称，是南北物流之枢纽。这也与临清竹竿巷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临清竹竿巷西头就在大运河码头——广济桥码头。当年，广济桥码头前“樯帆林立，货积山堆”，在这里还有钞关阅货厅。据《临清州志》记载，“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于卫河广济桥东岸（也就是竹竿巷西首）建钞关验货厅”。基于以上原因，江南大批毛竹、篙竹等竹货，通过大运河向北方贩运。大量竹货便在临清广济桥码头卸货，很多南方竹木商人、竹编工匠也随着上岸谋生，在临清靠近码头的街巷里，便逐渐形成了一条专门加工、贩卖竹货竹器的街道。

关于竹竿巷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江南有个叫朱刚的人，他见别人从南方往临清贩运江米、红糖、桐油、茶叶等发了大财，就想试着跑几趟。他想，北方毛竹甚缺，贩运此货定好出手，于是装了儿船毛竹运到临清。谁知北方人不熟悉毛竹，盖房时梁檩全用木料，毛竹卖不出去，把他难坏了。一天朱刚到集上散心，他来到一个卖编织器物的市场，看到手艺人用柳条、高粱秸和芦苇编织的筐、篮和席子甚是好卖。忽然想到，如果把积压的毛竹破开编些竹器，不就死物变活了吗？主意一定，他拜临清编织高手为师，将毛竹破成竹片、竹条和竹篾，没白没黑地学习编织技术。经过勤学苦练，朱刚编出的竹筐、竹篓、竹筛、竹帘等，不但样式精美，而且轻巧、美观、耐用。当时临清没有竹器物品，这一来就渐渐成了热门抢手货，不但使他的买卖兴隆起来，朱刚的名气也越来越大，生意红火起来。人们还给他起了个雅号，叫“朱巧手”。从此，朱刚住的这条街不仅形成了热闹的竹器市场，而且很快扩延到二里多长。后来人们因为朱刚的名号，将这条街叫做“竹竿巷”。

临清的巷子蕴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烙下了临清人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印记。

【史海钩沉】

清代涿源书院第六任山长宋弼

□张明福

涿源书院是清代山东最大，且存世时间最长的官办书院。它的历任山长和任教者均是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如宋弼、毕沅、桑调元、沈起元、何绍基、匡源、王之翰、刘耀春、朱学笃、缪荃孙等，也正是他们的言传身教，使书院文风兴盛，一时间誉满齐鲁。

宋弼曾担任涿源书院山长三年多，这也是他人生的闪光之处。宋弼（1703年—1768年），字仲良，清代济南府德州东乡冯家寨村人，明初刑部侍郎宋性的后裔。

清初由于朝廷害怕汉人聚集危及政权，“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待到康熙皇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便着手致力于文治，不但解除了对书院的禁令，而且还赐颁御书，鼓励增设书院。乾隆皇帝即位后，称“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下旨对书院山长和学生资格做了明确要求：“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

乾隆三年宋弼在顺天府乡试中考中举人，乾隆十年考取进士，后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未逾月，御试乾清官入高等，正在准备提拔任用时“以父忧去职”。乾隆十四年服闋还朝，充武英殿提调，担任《续文献通考》纂修官，按照朝廷规定的山长标准，宋弼是完全符合的。乾隆二十一年，宋弼在省母请假期间，被山东巡抚白钟山聘请出任涿源书院山长，直到乾隆二十四年底离职赴京，实际担任涿源书院山长三年多时间。

清代的书院已由以前的学术机构，转变成成为科举考试进行考前培训的机构。由于宋弼的才学和考进士之前的为教经历，省内很多士子听说当朝翰林院编修宋弼出任山长，远近求学者蜂拥而至。著名学者钱大昕为宋弼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宋弼）家故贫，（出仕前）教授生徒自给，既贵弟子著录益众。分教庶吉士，凡三科恒以师道自尊”。

在涿源书院的教学中，宋弼以科考所需的文章作为重点，要求学生先正程式，即先确立文体，不追求华丽辞藻，所以书院考中举人、进士的数量猛增。乾隆二十四年，山东乡试揭榜时，“（涿源）书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因此，“宋弼主涿源，十有八中举”也成为清代中期齐鲁大地的美谈之一，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之四二，也说到“（宋弼）主讲涿源书院，一时才士，裁成甚多”。

正是在任涿源书院山长这一职务时，宋弼得以与卢见曾、董元度、张元、李文藻等一批山东文人志士汇编出

版山左诗抄的愿望得以实现，并使编书的材料搜集如虎添翼。

宋弼借助书院学子来自省内各地的地缘优势，发动学生在山东各地广泛搜集清初和明代山左诗人的诗作及作者简介，为其顺利完成《国朝山左诗抄》和《山左明诗抄》两部鸿篇巨制奠定了基础。书院学生“遍搜昭代之诗，上自名公巨卿，下及隐逸方外”，搜集家乡诗人与诗作。部分学生如益都李文藻、淄博毕贻荣等，还直接参加了编辑加工。宋弼去世后，李文藻用三年时间使《山左明诗抄》面世。在“读死书”的科举年代，宋弼发动所有学生搜集整理全省明清诗人与诗作，无疑是让学生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

《山左明诗抄》共35卷，以时间顺序排列，收录明代山东诗人431名，收录诗作3608首。《国朝山左诗抄》共60卷，收入诗人536位，诗作5900首。两部书仿照元好问《中州集》体例，“每人各附小传，具列乡里出处，间缀名流评鹭，以备一代之诗史”。作为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山东诗歌的一部总集，两部书的价值首先在于文献保存意义，抢救和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山东历史资料。

宋弼担任涿源书院山长期间，根据自己参加科考的经历以及主持乡试时的发现，写成《试帖前选序》《试律新编序》《声调汇说序》《通韵谱说序》四文，对指导士子应对乡试和礼部考试有重要指导意义。

宋弼于乾隆二十一年撰写的《涿源书院丙子同学谱序》和于乾隆二十四年撰写的《己卯同学谱序》两篇文献，对我们了解涿源书院的师资和在校生数量、教学模式等提供了依据，从中还可以看到宋弼对学生殷殷教导的鲜活形象。

宋弼在《涿源书院丙子同学谱序》中写道：“乾隆丙子，予承乏兹席，于时当事诸公皆雅意作人，而观察桂林朱公专司教事，与督学广陵谢公，所以饮食教诲之为尤殷。盖士之集此百有余人，夙夜强学，怀席上之珍以待聘举也。乃以其姓名、年齿、乡贯、家世序次之，为同学谱，以无忘一时之谊。予惟诸生意良厚矣”。他在《己卯同学谱序》中说：“岁在己卯，山左之士集于涿源书院者九十人，相与朝夕砥砺，日月濯磨，饬行义，讲文学，蕲以上报朝廷育士厚泽，而下副其立身行道扬名于时之素志，彬彬郁郁，为甚盛矣。”

结合两篇谱序分析，涿源书院的办学体制为每三年一次招生，时间在乡试张榜之后，人数控制在百十人。每次乡试结束，标志着上一届学生结业，书院重新招收下一届学生。

【故地往事】

行走在运河岸边的巷子里